

广州文史资料

选辑第二十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7474/116

广州文史资料

(选辑)

第二十八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3年3月

封面题字：胡根天

封面设计：何世德



广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州日报印刷厂印刷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 7.5印张 140000

1983年3月 印数1—6,000

书号11111.105 定价0.77

目 录

- 战斗在方生与未死之间的一张报纸——
- 《人民报》始末记 梅日新 (1)
- 《人民报》广州版第二次被封侧记 吴锦华 (17)
- 侨二师学生的反迫害斗争 (1942
 —1945) 陆其章 (21)
- 侨二师学生1946年反逆流斗争 李颖群 (41)
- 侨二师“一二·一五”断炊拍卖运动
 王武兴等 (53)
- 广东陆地测量学校简史 熊耀培 (62)
- 兴华中学的沿革 李国材遗稿 (66)
- 广州早期的电影制片业 刘锦涛 (75)
- 广东国画研究会创立经过
 黄金海口述 余振驹整理 (84)
- 抗战期间何香凝在海丰兴宁 罗冠群 (88)

平洲针灯 林达三 (92)

解放前夕的广州新闻界概况 陈雪尧 (96)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路过龙门 黄云龙 (111)

武昌起义后广东光复的一些史事

..... 温翀远口述 吴吉康整理 (113)

惠博中心县委在日寇入侵时期的斗争 ... 麦 任 (115)

东区服务队与丘琮 卓 杨等 (123)

我对抗战初期广东抗日青年前卫团中山分团

活动的回忆 沈振中 (147)

有恒读书学习社活动情况的回忆 肖汎波 (151)

我参加抗战时期第二次粤北战役的回忆

..... 黎天荣 (158)

记广州基督教青年会第一届随军服务团

..... 李圣华口述 梁图光整理 (168)

“五五”旅行团的内幕及其活动的片断回忆

..... 梁蔼怡 (184)

梁培基参与倡建从化温泉事略 梁尚为 (189)

广州市达保罗医院片断

..... 钟舜英口述 梁松生整理 (196)

- ① 战后美国新闻处与广州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
和活动 王以敦 (200)
- ✓ 解放前广州基督教会分布概况 何 因 (208)
- 广东近代民间航运业发展史略 伍 锦 (214)
- 我岳丈许崇智有关之三事 潘 岩 (232)

✓ 战斗在方生与未死之间的一张报纸

——《人民报》始末记

梅日新

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饱受内忧外患，迫切需要一个和平、民主的环境，来重建家园，迫切希望建立和平、民主、独立繁荣的新中国。一个如火如荼的民主运动，正在全国开展着，国民党蒋介石迫于形势，不得不与共产党谈判，不得不召开有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并通过五项决议①。因此，维护政协五项决议并付之实现，还是反对和破坏它？成为当时政治斗争的中心。《人民报》就在这个历史关键时刻应运而生，它的任务是围绕这一斗争中心进行报导、评论。《人民报》的始末记载了民主与独裁、和平与内战斗争的一个历史侧面。

《人民报》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机关报，于一九四五年秋冬之间开始筹备。首要的问题是筹划经费，当时正是日寇投降后，国民党与共产党签订了“双十协定”②，不少人对局势的发展抱乐观态度，以为联合政府很快就会成立，对第三党（农工民主党前身）办报表示支持和赞助。由彭泽民、

丘哲、李伯球、郭翹然和杨建平（当时农工党中央财务委员会副主任）等几位老同志出面，向同第三党有关系的友好人士募捐了约五万元港币作为开办费。一九四六年二月底筹备就绪，三月一日《人民报》在香港创刊出版。地址设在香港毕打街毕打行二楼，这只是发行及与外界联系工作的地点。而编辑部、经理部，则设在香港坚道一三七号三楼，四楼为职工宿舍。该报发行人是丘哲同志，社长是李伯球同志，社论和专论主笔是黄药眠同志，总编辑原定卓炯同志，他因事未到职，由副总编辑张琛同志代理（中共党员，解放后任华南分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编辑委员有李伯球、陈晓凡、曾伟、张琛等同志，经理是李世浩同志，编辑有丘一中同志等，搞发行工作的是李克平同志（中共党员）。该报设国内新闻版、国际新闻版、副刊版、地方新闻版，有资料室、译电室、校对室。还订购了各国通讯社，如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法新社等的电稿，国内则有新华社、中央社等电稿，另外还设有广告组等。全社职员包括编辑人员、记者和工友等约四、五十人，除了没有印刷厂外（也在准备成立），可说是略具规模。

当时在香港的中共负责人，对《人民报》的出版，极为重视，多方协助，提供人力物力。如《华商报》重要负责人刘思慕同志，经常具体帮助，他通过副总编辑张琛同志并经社长同意，聘请中共党员当编辑、记者、校对人员、资料人员、发行人员等计有八、九人，这些同志积极努力与农工党

同志并肩战斗，合作共事关系极为和谐。共产党员的不计报酬，忘我劳动，为报社同志作出榜样。

在香港出版的《人民报》是日报，四开版，共出版了三十期，于同年四月一日迁广州，继续出版。

在广州出版的改为三日刊，八开四版。出版了三十期，在后，还以周刊、半月刊的形式出版了六期，直至一九四六年八月底，被国民党反动派强迫封闭停刊，前后斗争达半年之久。

现分别从香港版和广州版来说明它的宗旨、主要内容、经过情况和遭遇以及它在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所起过的作用。

香港版的情况：

《人民报》出版的宗旨，在创刊词中鲜明地写着：“本报创刊于这世界民主的新时代，又是正当反民主的逆流之际，一方面我们感到骄傲，一方面又感到自己的责任实重且大，现在于工作开始的第一天，提出以下几点作为奋斗的目标：

（一）是巩固世界和平，主要的是促进中英美苏的和平合作，加强世界进步的民主力量，以肃清法西斯的残余，扑灭战争的因素。

（二）是促进中国真正的民主政治之实现，巩固全国和

平统一，建设和平、自由、独立、繁荣的新中国。

(三) 是普遍改善人民生活。

(四) 是争取言论自由、学术思想自由与发展科学。

本报站在人民立场与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一切党派、团体，竭诚合作，督促政府，以求实现。”

这个创刊词是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对当时局势的看法和政治态度。在第一版中，章伯钧以当时农工民主党中央负责人的名义亲笔写了贺词：“我们为彻底完成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为实现民主政治及争取社会主义前途，奋斗迄今已十有九年。兹当民主和平建国之始，我们更须加倍努力，站在中国农工平民之立场，求上述三大任务之达到，愿与全国各民主党派长期合作。《人民报》应此使命诞生，任重道远，应自奋勉，以无负于全国人民之期望”。这阐明了农工党的政治主张。

当时，在香港除了《华商报》、《正报》等进步报刊外，又增添了《人民报》，替人民说话，因此受到了各方面进步人士的支持和援助。在发刊一星期内陆续收到中共中央、各民主党派和进步民主人士等亲笔写的贺电贺词：周恩来同志的贺词为“人民之友”，董必武同志的贺词为“人民呼声”，沈钧儒同志的贺词为“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为大众而呼唤。我们要建立整个的民主政治，建立和平、统一、进步的新中国”，茅盾同志的题词为“人民报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说话的报纸。请以二语：向人民学习，同时

也教育人民，敬祝人民报的成功”，李济琛先生的贺词为“人民喉舌”，还有彭泽民、蔡廷锴、李伯球、张文等同志的贺词。这些贺词不但给办报的同人很大的鼓舞和鞭策，而且给广大的读者深刻的教育。

《人民报》在第一版除了登载国内外重要新闻外，还着重配合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发表社论、专论和专题报导。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于一九四六年三月七日至三月十七日在重庆召开。全国人民注视着它，各民主党派希望国民党当局能够履行政协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案以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成立联合政府。但是国民党死硬派对政协决议大肆攻击，认为执行政协决议，是“国家自杀的方法而必须设法纠正”，CC分子谷正纲等叫喊“救国必先救CC党”，要求开除国民党民主派冯玉祥、邵力子等国民党党籍，气焰极其嚣张。这样，一场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展开了，《人民报》记载了这场斗争的一些情况。章伯钧发表谈话时指出：“二中全会是考验国民党能否真正走民主政治的道路”；周恩来同志三月廿一日在重庆招待记者座谈会上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阴谋在中国保持一党专政。”又说：“若国民党延长专政制度，中共将拒绝履行协议”。民盟负责人谈话指出：“倘国民党不能遵守一月政协会议所获得的协议，民盟将保留不参加国民大会的权利”。

在这期间，《人民报》为这场斗争一连发表了五篇社论：三月十七日《论国民党二中全会》，十八日《政协所有

协议不容许任何修改》，十九日《再论国民党二中全会》，廿一日《谁破坏政协会议的决议，谁就破坏统一和平》，特别是在廿三日发表的《提高警惕，坚定信心》的社论，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通过了很多违反政协会议决议案，引起了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一致严重抗议”，“由于国际国内和平民主力量的空前壮大，已决定了我们这一代的历史方向，这一坚定的历史方向，绝不是法西斯余孽的反动顽固分子所能扭转过来，风浪虽然险恶，和平民主的航船在颠颠盈盈仍是必然向着既定的方向驶去的，一切反动顽固分子都将被打得粉碎。因此，在目前这个严重的局势下面，不警惕到反动顽固分子的猖獗疯狂所酝酿的巨大危险，以为一切都已妥当，因而盲目乐观形成麻木是不对的，同样见不到人民的和平民主力量的强大，见不到时局发展的前途，因而丧失了对和平民主事业的信心，以致悲观失望也是不对”。社论还号召：“一切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提高警惕，坚持政协决议……加紧发动群众，团结人民，去击碎反动顽固分子的最后抵抗”。无疑，这些社论对教育人民，团结人民，对反动派进行斗争，都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该报在每星期日，还约请各方面专家、评论家撰写星期论文，如刘思慕的《美国对日韩的政策》、狄超白的《论官僚资本与国民经济》、千家驹的《开放外汇市场后的外汇前途》等，这都是有价值、有分量的文章。编委也写了专论，如曾伟的《论国际上的两条阵线》。

在国内版曾出了两期专刊，一期是“张炎将军殉难周年纪念特刊”，它除介绍了张炎将军史略^③和强烈谴责国民党的罪行外，还有彭泽民同志的题词“光垂南服”，李章达同志的题词“志切救民”。

另一期专刊是“三·廿九”黄花岗节，有丘哲、李伯球等同志的纪念文章。

人民报副刊名为“语丝”，由楼栖、叶春同志主编，一共出版了二十六期，刘白羽、李广田、陈残云、紫风、孙孺、胡明树等作家经常为该刊写文章，以辛辣讽刺的笔调，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嘴脸和报道蒋管区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来激发和教育读者。还发表了吕骥、孙慎纪念冼星海的文章等。

《人民报》从创刊之日始，每天从香港寄往广州销售的报纸，同《华商报》、《正报》一样，经常受广州国民党当局禁扣，虽屡经向广州当局提出抗议，但仍屡被禁扣，以致广大读者买不到当日报纸，看不到真实的报导和听不到正义的呼声。为了配合当时政治形势的发展，争取公开、合法的斗争，接受中共华南分局的建议，农工民主党组织决定将《人民报》迁往广州出版。在三月三十、三十一两日发表告读者：“本报站在人民立场为促进祖国和平民主事业而努力，出版以来，辱承海外社会人士热诚赞助指导，使本报内容与业务得以改进与发展，至深感奋。现在为应国内广大读者之要求，决于四月一日迁往广州出版”。在副刊上，编者

以充满革命的激情写下了告别书：“挥手扬巾，我们暂时告别了，任何困难阻止不了我们空间的距离，反把我们的心的拉得更紧。我们的心正朝着同一方向，我们的步伐也朝着同一的方向。为着广大的人民，为着民主的大业，我们的心，向着光明，向着祖国”。

至此，《人民报》结束了它在香港的一段战斗历程。

二

广州版的情况：

在出广州版以前，我们对各种情况都作了估计，既要利用有利条件，争取较好的前景，又要作最坏的打算，可能发生“封屋拉人”事件。张发奎是当时国民党广州行营主任，过去，他同老三党的一些领导人有过往来，为了减少阻力，以彭泽民、丘哲两老的名义致函与张发奎。根据丘一中同志的回忆，该函大致说，《人民报》迁广州出版，其宗旨是反对内战，争取民主，成立联合政府。我党（农工民主党）有责任督促国民党，促其遵守政协决议。并请张以地方官的权力，给予《人民报》以各种便利。更有责任保护《人民报》不受反动分子扰乱破坏等语。这封信是通过麦朝枢转交张的（麦是张的秘书长，过去同老三党有过关系。农工党中央在抗战期间出版的《抗战行动》，他是发行人）。据说，张接到此信时，看得很认真，但没有什么表示，既不反对，也不赞成。后来张发奎也通过麦朝枢转告我们，要办理登记手

续，并说“这只是照例而已”。我们也“照例”登记了。

《人民报》广州版发行人仍是丘哲同志，社长仍是李伯球同志（当时组织决定在李同志因公赴渝未返穗前，其职务由郭翹然同志代理），总编辑初时仍是张琛同志（当时任文化大学教授）担任，经理是梅日新同志，编辑有汪叶舒、记者有温流同志等。

在出版前，碰到的困难是印刷问题，当时广州的各印刷厂都嫌我们政治色彩较浓厚怕连累他们，不肯承印。后来通过中共地下党的介绍，同“广州工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工合”，是斯诺、艾黎等外国进步人士主办的一个企业）联系，他们不怕冒风险，毅然承接印刷任务，使《人民报》能如期出版，我们深受感动。

由于报社全体工作人员共同努力，克服种种困难，经过一个星期的筹备，于四月六日在广州出版了第一期。在复刊词上写着：“我们为着保证抗战胜利的成果，所以我们要争取民主；我们为着全世界人类不致再被法西斯战争危害无数千百万生命财产，所以我们要争取民主……本报为着适应时代要求，在国内与社会贤达、各党各派的民主人士合作，与所有民主力量联合起来为一个和平自由独立繁荣的新中国而奋斗。”

《人民报》在广州出版，港、穗新闻界极为重视，港穗许多大报都登载了消息。各方面进步人士也赠送贺词：“人民报三日刊今天出版了，这是一个为和平、民主及团结而努

力的刊物。一定会得到广大民众的同情和欢迎。”陈残云同志在副刊前小语，满怀革命激情地写道：“现在该是长夜将尽的时候了……我们的悲和喜，笑与泪都和人民一致的。我们以壮大的脚步，踏碎一切痛苦和阻挡，走向光明，走向胜利。”

《人民报》以争取和平，争取民主，争取进步的崭新面貌出现在广州人民的面前。

广州版是八开四版的小型报纸，在第一版上经常登载国内外重大政治新闻，特别把广州的民主运动情况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有浓厚的地方政治色彩。第二、三版专门登载全国各地民主运动情况、专题采访和各地重要新闻。第四版是副刊，继续取名“语丝”，由楼栖同志主编，华南著名作家陈残云、楼栖、周钢鸣、易巩、于逢、胡明树等经常为该刊写稿，深受青年、学生读者的欢迎。

它的发行量约三千多份，一般销售额约千份。还设有三名专门的推销员，他们是东江纵队的“红小鬼”，其中一名是赖启同志（现任省文化局办公室副主任）。还有一部分报纸由《人民报》驻港发行组推销到港澳和国外。

当时广东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是国共两党所签订的停战协定和东江纵队北撤问题能否实现。而执行这个任务的是军事调处执行部第八小组，它由三方面组成：中共代表是方方将军，美方代表是米勒上校，国民党政府代表是王衡上校，共同执行上述任务。但由于国民党政府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

顽固地不承认广东省中共领导的武装，竟颠倒黑白把浴血奋战八年的东江纵队污蔑为土匪部队，激起了广东人民的义愤，受到进步舆论的强烈谴责。而更有甚者，国民党一面进行谈判，一面积极部署打内战，调兵遣将，围剿游击队，国民党部队张光琼等率领两个师和两个保安团由坪山、淡水等地向东纵压过来，企图消灭东纵北撤人员，当时广州《人民报》和在香港的《华商报》、《正报》，揭露了国民党的阴谋，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密切注意事态发展，使国民党当局十分惊慌。他们对进步报刊更加仇恨。

与此同时，《人民报》还登载了中共代表方方等同志与国民党广州行营签订了东纵北撤协定三原则：（一）东江纵队北撤到山东解放区，北撤路线由广东的惠阳县沙鱼涌出发，由海道北上到烟台登岸，由共方出钱租用美国三艘登陆艇作运输工具；（二）北撤人数：二千四百人；（三）时间：开始集中之日至登船之日止，以一月为限，不得超出。（笔者按：据当时报纸报导，中共租用三艘登陆艇于六月二十九日下午驶入大鹏湾，三十日早晨登船，七月五日早上到达山东烟台。）

以上消息的发表，受到广大读者的重视，报纸一出版，很快被抢购一空。但这消息来之不易。因为国民党广东当局生怕人们从中共代表那里得到正义的声音，千方百计地封锁消息，宣布一律不准记者进行采访和报导。当时中共首席代表方方下榻在沙面复兴路六十四号，国民党派出一群特务和